



维吾尔族年龄堆积问题的人类学考察

——以新疆库车县调查为例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2)03-0005-08

●王海霞

摘要 在过去的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发现,维吾尔族年龄堆积现象十分突出,农村高于城市,女性高于男性,而且年龄越大,堆积现象越严重。本文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将年龄堆积现象进行分类,从社会文化上深入探讨其成因,对人口普查和抽查提出五点可行性建议,并预测今后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年龄堆积;比较优势;情境化;社会互动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志码] A

不少学者运用差分法、惠普尔指数、迈耶斯指数和联合国综合性指数等方法,对过去60年中全国进行的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了检验,发现在历次人口普查中,维吾尔族的年龄堆积现象是所有民族中比较突出的。

人口统计学上的所谓“年龄堆积现象”,是指由于误报,以某一数字结尾的年龄或某一年龄的人口远远超过以其他数字结尾的年龄或其附近年龄的人口,从而使整个人口年龄数字不准确的现象,又称“年龄结”现象。这是人口普查年龄数据常见的误差之一,会造成漏报和错报。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数字偏好”,如维吾尔族和藏族倾向于申报偶数结尾的年龄。^①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边疆民族心理、文化特征与社会稳定研究”(项目批准号 08jzd0023)之阶段性成果。

① 李成亮.“五普”百万人口以上少数民族年龄申报准确性研究[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4):66.

学者们在对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后发现,维吾尔族在以“0”、“5”结尾的年龄上有明显的堆积(尤以0为多)①,误报的区间集中在40~49岁。②其中,女性误报年龄的比例多于男性,农村多于城市,南疆多于北疆(喀什、和田和阿克苏三地区尤甚)③,在18岁、45岁、60岁上的堆积现象最为严重。④其中在维吾尔族高龄人口中,年龄误报情况普遍(90%以上),以多报为主(70%以上),多报幅度大(每人每年平均多报0.56岁以上)。⑤

为什么维吾尔族的年龄堆积现象如此突出?不少学者还进行了原因分析,认为这与维吾尔族记年龄的习惯、敬老习惯、该人口群的文化水平、调查员素质⑥、户口管理体系、户口档案误差⑦等有关,提出了实用的调查甄别法。调查之后又该如何减少误差呢?有学者提出,可以运用整体“修匀和内插”的内插法、喀拉普一金方法(Karup—King Method)和哥拉比方法(Grabill Method)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以减少误差。

在前人的研究中,从人口学视角开展的研究多,从文化视角深入调查分析的不多,因此笔者于2005~2007年为完成博士论文,赶赴阿克苏地区库车县牙哈乡克日希社区,进行了为期11个月的田野调查。其中尤其关注到年龄在社区中具有的文化意义,希望对年龄堆积现象进行深入探讨。

该调查点处于以阿克苏、喀什、和田(又叫南疆三地区,截至2007年底,三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占全国的维吾尔族人口的72%⑧)为核心的南疆人口中心区,⑨是维吾尔族聚居的一个南疆农村社区,与前述研究所指的特征十分吻合,因此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并对各项调查数据仔细甄别后,笔者认为,可以把年龄堆积分为以下三类:

- (1)高报年龄,主要是3岁以下、50岁以上的男女,高龄组中年龄越大的人,多报的幅度越大;
- (2)低报年龄,主要集中在40~49岁的女性中;
- (3)年龄偏好,偏好“5”、“0”结尾的年龄,其中18岁、45岁、60岁(尤其是男性)的堆积尤

① 郭琳,车士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00年年龄堆积现象的分析[J].西北人口,2008,(2):111.

② 黄荣清.中国百万以上人口的民族在人口普查时年龄申报的准确性[J].中国人口科学,1993,(5):16.

③ 乔晓春,李建新,杨力民.新疆人口年龄堆积现象分析——新疆人口年龄堆积现象研究报告之一[J].人口研究,1993,(4):27.

④ 乔晓春,李建新.对新疆人口年龄结构的调整与分析——新疆人口年龄堆积现象研究报告之三[J].人口研究,1994,(4):31.

⑤ 刘同起.新疆高龄人口中的年龄误报现象分析[J].人口研究,1991,(1):25.

⑥ 李建新.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年龄堆积现象的分析[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37.

⑦ 纪瑞斌.新疆人口年龄误报问题的成因及对策[J].人口与经济,1994,(4):19.

⑧ 数据来源:新疆统计年鉴(2008年)。

⑨ 左永君,何秉宇,龙桃.1949~2007年新疆人口的时空变化及空间结构分析[J].地理科学,2011,(3):362.

为明显。

本文将从年龄之争入手进行原因探析,希望能找出有效方法,以减少调查误差并预测出年龄堆积现象今后的发展趋势。

一、年龄之争

在一般人看来,年龄应该是一个毫无争议的话题,出生年月日应该镌刻在亲人的脑海中,记录在户口本和身份证上。然而在克日希社区不是这样,人们常对户口本和身份证上的年龄提出质疑。有人说那是自己或父母随口报的,也有人认为是村干部随意填写的,与实际不符。人们往往对自己出生时的季节和天气特征记忆深刻,而对出生年月只能靠推算和比较。在不同的场合,年龄都是询问和讨论的关注点,人们对年龄的自述常常不一致,在一定区间波动,波动幅度在不同年龄段也有所不同。人们似乎更关注相对年龄,而不是绝对年龄。在这个调查点,年龄似乎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尤其在同性同龄群体中,因年龄引发的争议常常持续很多年,在年长者中尤为常见。

案例1:坐在村中心水渠边候车的两个少妇争论声越来越大,把大家都吸引了过去。原来两人同年出生,A^①说自己是下雪天生的,B说自己是春耕生的,并认为A是年初下雪时出生,比自己大。两人都举了些例子,说自己更小些。围观者中有年长者边听边发表意见,似乎在主持公道,年轻人则边听边笑……

案例1说明,人们似乎只对出生时的气象和农时记忆深刻,争论的焦点是看谁更年轻。人们是不是都喜欢比小呢?

案例2:A汗老太在谈到年龄时,就会提到邻居W汗老太:“她说比我大,我却记得小时候,还在抗日吧?有一次我们几个去沙漠里打柴,她走不动了,我们还轮流背过她呢!”言下之意,自己实际上比W汗年长。

从案例2可见,年长者更喜欢比老。为增加可信度,通常会提到一些历史事件,以同龄同性者为参照,证明自己更为年长。

案例3:当一个跟S年龄相仿的客人问到S的年龄时,他故意少说了3岁,几个孩子在一旁默不作声。他说完后回头给我递了个眼色,示意我不要纠正他。事后解释道:“我跟他开玩笑,逗着玩的!”

案例3说明人们自述的年龄会根据心理或情景的变化发生变化。除了同性别的同龄人,其他人之间不会争论年龄,一切以个人的自述为准,即使明知矛盾百出,也要给对方“留个面子”,不会当众戳穿。在长期观察中发现,人们通常对年龄之争表现出不较真、不质疑、不评价、视之为玩笑的态度。这一独特的表现激发了笔者的好奇心。

真的如某些学者所言,农村维吾尔族对年龄没有概念吗?经过深入访谈,笔者发现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太看重年龄了,人们才会围绕它寻找各种话题。

难道没有人知道每个人的确切年龄吗?笔者了解到,在当地有两类人对社区内每个人的年龄了如指掌:一类是每个清真寺为人们主持人生仪礼的伊玛目(清真寺主持),一类是村委

① 鉴于学术伦理的原因,本文中的人名均为化名。

会历任的妇女主任(当地叫女村长)。伊玛目为教区内所有的人主持命名礼(出生 2~3 天)、割礼(9~15 岁的少年)、婚礼和葬礼。每个仪式上,伊玛目都要清晰地说出举行仪式者的年龄,这具有绝对权威,无人会提出异议。村委会的妇女主任主管计划生育,常常登门入户,及时上报出生与死亡数据,对辖区内的社情民意了如指掌。

那么为什么人们如此关注年龄问题呢?

二、原因探析

笔者认为,农村维吾尔族的年龄堆积现象,一定与当地社会文化传统和社区环境有关,尤其应关注到社会分层、人们的互动方式、民间信仰和民族心理等方面,从客观与主观影响因素两方面加以分析。

1. 客观影响因素

(1) 历史原因

历史上维吾尔族曾使用过历法与属相,可惜由于受教育者有限,并没有普及到民间,家长们除了记得当时的天气特征和农时之外,无法准确地记住孩子们的出生年月日。如案例 4 所示。

案例 4:T 老人 1947 年曾上过一年学,在询问过不少亲戚后,他推算出自己生于 1938 年麦收季节。为此邻居 B 老人一直不服气,认为 T 老人这么一算,不是比自己大了吗?当初他们一起上的会立学校,根本没人教数学!这种推算有什么根据呢?

案例 5:Y 喀里是文革前后上的学,学的是新文字,可是 80 年代后维文又改为老文字,他读不了书,看不了报。虽然当年上过数学课,滑稽的是他们的数学老师连 1987 年教育局的考试都没过关。他指着户口本对我说:“父母没文化,谁能说得清自己的出生时间呢?还不都是估算的?”

案例 5 表明,解放后虽然普及了世俗教育,但文字的两次变动,造成了新一代的识字文盲,①再加上数理化是当地的教育短板,人们对数字的表达很难做到准确无误,在一个区间内(如 0~5)波动成为常态。

(2) 确定社会角色的重要指标——年龄

南疆的维吾尔族大都聚居在干旱少雨的绿洲上,社区间相距较远。以畜力为主的交通和以农牧业为主的生计方式,造成这里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都相对稀缺,家户之间可比较资源十分有限,其中年龄就被看作一种无形资源。

维吾尔族农村社区十分注重等级秩序,俗话说:“qoliba su qujup birelmeslik。”直译是“不配给倒洗手水”,意译为“长幼有序,门当户对。”②甚至在称呼上都有所表现:女性年轻时在

① 1963 年前使用以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为基础创制的老文字,1963~1983 年期间改用以斯拉夫文为基础创制的新文字,1983 年之后又改为老文字。此间受教育的一批人不认识老文字,这批新文盲年纪在 45~65 岁之间,大都是社区中的主要劳动力。

② 客人进门要先洗手,给客人倒洗手水很有讲究,男人给同龄男人倒,女人给同龄女人倒,尊贵的客人由男主人或长者倒。王德怀.从熟语看维吾尔族的好客习俗文化[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5,(2):58.



名字后加“gul”(读为“古丽”),年老后在名字后加“han”(读为“汗”);男孩在名字后加“jan”(读为“江”),年长后加“kari”(读为“喀里”)。

性别和年龄成为人们确定社会角色的重要指标,这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婚宴是按照家庭户,分男女、分年龄段安排在不同时段的。如20~30岁之间的人,已婚并独立门户的女性通常在下午1点左右与几位女友结伴赴宴,带不带孩子要看同伴的,同龄的已婚男性通常是下午2点左右到场。同样在做客时,通常男女不同席,人们会按照年龄大小依次入座。当条件有限,男女必须同席时,人们在屋门外就会主动分性别、分长幼站成两列,然后鱼贯入门、落座。为表达对他人的尊重,同性同龄者之间会相互谦让。

南疆农村的维吾尔族社区类似于滕尼斯笔下典型的礼俗社会。由于同质性较强,社会分层更侧重于性别和年龄等先赋特征。其中年龄分层跨度不同,大致可以分为6个阶段:婴幼儿期(0~6岁)、青少年期(6~15岁完成割礼后)、青年期(16~30岁完成婚育任务)、壮年期(30~45岁完成教育下一代任务)、中年期(45~60岁完成代际传递)和老年期(60岁以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根据社区预期和所属年龄层的规范,结合情景扮演自己的角色。其中对所属的年龄层不存在异议,只在同性别的同龄群体内出现争议。

(3) 尊老爱幼的社区传统

年少者尊敬年长者,年长者保护和照顾年少者。

案例6:几个小男孩一起搬土块。负责递送土块的老人不停地劝大个子L少搬一些,还不时地给他递一些沾土比较少的土坯,遇到打水的轻活儿就会派他去……当问及原因时,几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他小呗!”原来L是几个同龄孩子中月份最小的一个。

如案例6所示,年轻者不仅能得到人们的关照,还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事实上,相对年轻会备受关照,所以50岁以下的同龄人(尤其是女性)在一起喜欢比小;同时,年长者遇事有发言权,备受人们尊重,而且越年长越容易成为纠纷的调解人和社区舆论的主导者。

鉴于以上原因,有些人似乎是一夜之间变为老人的,这明显表现在外表的变化上:女性穿上长裙、披上围巾或面纱,男性穿起长袍、靴子和套鞋,蓄起胡须,每天去清真寺念经,加入到“jama'at”(读作“佳玛艾特”,指寺民)的行列中,经常和伊玛目(清真寺主持人)一起,为教区内的人们主持各种仪式,他们掌握着社区话语权。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如家庭纠纷或邻里不和,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最年长的男女,希望他们能出面主持公道。在这类社区,人越年长越受尊重。所以60岁及60岁以上的老人喜欢比老,有意夸大年龄的情况比较常见。

(4) 与早期的民间信仰有关

与其他民族相比,南疆农村的维吾尔族婴幼儿(3岁及3岁以下)死亡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有资料显示,1997年在南疆一些贫困县,孕产妇死亡率达到10%以上的高水平,个别县婴儿死亡率达到200%以上。^①

当地人一致认为,3岁以内的婴幼儿生病或夭折是因为受到了魔鬼的侵袭;孩子越小,受侵袭的危险性越大。这与历史上生活在塔里木盆地的维吾尔族先民曾信仰过自然神、萨满

^① 董玉芬.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生殖健康问题与对策:世纪女性的思考[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83.

教、祆教等有关。虽说当地人现在早已改信伊斯兰教,但民间信仰仍占据重要地位。人们崇拜神灵,畏惧魔鬼。为了趋吉避祸,家人在诵经祈祷平安的同时,通常会对外高报(或夸大)孩子的年龄。

(5)与户籍管理不规范有关

解放后,我国开始推行户籍制度,人们常常根据需要自述年龄,即使在人口普查中发现年龄有明显出入,也无人认真核实。从60年代末到1982年,当地政府规定,新生儿能得到10斤大米和30斤麦子,所以孩子一出生,家人都立即报户口。^①1982年之后这一政策有所松动,及时报户口的事逐渐减少,有些人一拖就是十几年,直到要办理结婚证时,要用身份证、户口本和村委会开具的证明,人们才不得不去报户口。

笔者在调查点看到,2005年6~7月,库车县牙哈乡派出所派出户籍小分队奔赴各村,把各家各户的信息全部录入电脑,各户的户主亲临现场,核实户口和身份证。这是建国以来首次实现的户籍联网统一管理。

2. 主观影响因素

(1)情境化社会互动的需要。在农村维吾尔人的眼里,年龄这个毋庸置疑的静态指标是富有弹性的,它已经成为一种动态指标,可以随着情景的需要而变化(如案例3所示)。人们视自己与互动对象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最为合宜的态度。首先人们会根据情景确定自己的相对地位,然后根据社区期待扮演自己的角色,对年龄的自述往往根据自我需要及当时的心态进行调整,因此很容易在同龄群体中引发争议。

为了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人们自述年龄时常用手势比划,一方面增加表达的多样性,显得幽默,另一方面增加神秘感,引人浮想。其中“5”和“0”结尾的年龄便于表达,表现在数据上,“0”偏好最为明显,其次偏爱“5”。如此一来,人们的年龄似乎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容易满足情景化的表达需要。

正因为如此,当地人对年龄的争论才会不较真、不质疑、不评价,有时甚至一笑了之。

(2)家庭比较优势的需要。调查点的人们很“爱面子”,喜欢相互攀比(比老和比小),在比较中处于优势地位,借此证明自己的成就。有时,比年龄往往成为比较成就感的主要方式。

案例7:参加某人葬礼的M女士路遇D女士(在另一个村),两人见面分外亲热。望着D女士的背影,M女士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我们俩是同一个星期结的婚,别看她比我大一岁,生孩子可比我晚半年。你看现在我都抱上外孙女了,她女儿还没念尼卡(指结婚)呢!”

在案例7中,M女士的自豪溢于言表,是因为人们把在生命历程中某一特定阶段顺利完成发展任务视为一种成就,如未到婚龄就有人上门提亲、提前完成婚育任务、40岁前后抱上孙子、老人长寿等。

其中18、45、60岁的年龄堆积现象较为突出。

①18岁男性的年龄堆积是参军入伍导致的,通常不足18岁者高报年龄。女性的年龄堆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高报为18岁(法定结婚年龄)。未满18岁就有人上门提亲,说明其邻里和睦,家教良好,社区口碑好。为了尽早完婚,少数人甚至更名、改年龄,如案例8所示,

① 查瑞传,乔小春.新疆维吾尔族人口年龄堆积原因的初步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1993,(1):29.

这会造成人为误差。

案例 8 :明天是 K 姑娘的婚礼 ,我忙着为筹备婚礼的女士们拍照。K 姑娘的表妹偷偷告诉我 ,三天前某宗教人士前来为 K 姑娘举行了命名礼 ,看上去只是改名字 ,其实是为了改年龄。命名礼之后村委会出具了证明 ,他们直到昨天才到镇政府办理了结婚证。

第二种情况是低报为 18 岁。当地人认为女孩晚婚显得“没面子” ,如果女儿 20 多岁仍待字闺中 ,家长要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为保住“面子” ,直到结婚 ,家人都会对外宣称姑娘 18 岁。

②45 岁的堆积有两种情况 :一则让孩子们完婚是父母应尽的一种宗教义务 ,如果孩子未能及时完婚 ,常会低报年龄 ;二则出于宗教的回归 ,当地人通常从 45 岁左右开始逐渐退出生产领域 ,回归宗教 ,到 60 岁左右要完成这一人生转型。人们通常在 45 岁前 ,一天行 1 次晨礼(早晨念经) ,45 岁后才增加到一天 5 次礼拜。那些 45 岁前就已经开始行 5 次礼拜的人 ,被认为是虔诚的穆斯林 ,在社区内备受尊重 ,他们会对外高报年龄为 45 岁。

③60 岁的年龄堆积与家庭的代际交接有关。不到 60 岁就顺利将家庭经济大权传给幼子(维吾尔族实行的是幼子继承制)的家长 ,为了及早享受长者待遇 ,对外会高报为 60 岁 ;而那些代际交接不顺的家长 ,通常会低报年龄 ,以免在社区中失去比较优势。

(3)与女性扮演的角色有关。与其他社区一样 ,年轻被女性视为一种资本。40~49 岁组的女性年龄堆积与当地性别分工有关。女性负责社区内交往 ,她们要打理各种人情 ,如婚丧嫁娶的随礼 ,走亲访友的送礼等。这种“外交大使”的形象事关家庭的“门面” ,因此参加各种活动 ,甚至到邻家做客 ,她们都要精心打扮一番 ,戴上金首饰 ,穿上做客的礼服 ,尽量装扮得年轻靓丽 ,隆重出场。

案例 9 :入户访谈时 ,S 女士说自己现年 38 岁 ,丈夫自述为 43 岁。望着子孙绕膝的她 ,我惊叹不已。当谈到初婚年龄时 ,她说当初 17 岁 ,跟丈夫相差 2 岁。我对此提出了疑问 ,她边纠正丈夫边给他递眼色 ,丈夫却坚持自己的说法 ,两人争执起来 ,我连忙转移话题。等 S 女士出去喂鸡时 ,她的丈夫悄悄告诉我 ,实际上她 41 ,自己 43。

如案例 9 所示 ,女士低报年龄是为了表明自己年轻 ,以年龄优势证明自己“有成就” ;同时以社区羡慕的“老夫少妻”模式 ,为丈夫“长面子”。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女性的年龄堆积现象较之于男性更为突出。

综上所述 ,在南疆农村的维吾尔族中 ,“年龄”成为社区内人们确定社会角色的一个重要指标 ,尊老爱幼的社会传统、民间信仰的影响、户籍管理的不规范等构成年龄堆积的客观影响因素 ;主观影响因素是情境化社会互动的需要、家庭比较优势的需要以及女性扮演角色的需要等。人们对年龄的态度可以折射出一种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

三、修正误差的建议

为了今后高质量完成人口普查和抽查任务 ,减少误差 ,避免上述年龄堆积现象 ,笔者建议从以下几点入手 :

(1)严格挑选和培训调查员。鉴于在南疆维吾尔族农村开展人口普查的难度 ,调查前严格挑选和培训调查员至关重要。他们要熟练掌握维吾尔老文字 ,最好采用边问边答的方式

作调查,由调查员填写调查表。这样既节约时间,又便于调查员发现问题及时询问,待被调查者领悟后,准确作答。避免因调查引发的矛盾和纠纷,调查员应具备良好的心算能力、沟通能力和应变能力。

(2)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为防止产生比较优势心理,在开展调查时,尽量避免多人在场。最好由知情人(如村妇女主任)带领调查员入户,这有利于避免自报年龄的随意性。

(3)确定调查对象。调查对象不同,调查误差也会有所不同,理想的调查对象是户主夫妇同时在场。因为男主人负责对外交往,对家庭成员的情况表达得更清晰;女主人负责保管所有证件,如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等。可以请村委会负责人提前通知户主减少外出,确保调查的顺利实施。

(4)打消被调查者的顾虑。人口普查和抽查的目的是全面详尽地调查我国人口的真实状况,在进行正式调查前,有必要强调保密原则(对所在乡镇保密),打消被调查者的顾虑。因为当地政府规定,一旦发现更改年龄、与普查年龄不符、各种证件年龄不一等情况,各级干部自下而上都会受到牵连。要说服被调查者上报真实可靠的年龄。

(5)多途径核实年龄。调查时可以参照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育龄妇女登记册(妇女主任处)等。当以上记录不一致时,首先通过小型问卷或结构式访谈(调查前培训)进行甄别,最多不超过5个问题,从初婚年龄、初育年龄、夫妻年龄差(对初婚者)等,推断所报年龄的准确性。尤其在遇到“0”、“5”结尾或“18”、“45”、“60”岁的年龄时,这种方法更是首选。可以把一些有异议的年龄集中起来,单独询问妇女主任(历任)和所在教区的伊玛目。

四、问题的发展趋势预测

如前所述,5个主观因素和3个客观因素造成年龄堆积现象,笔者提出了5点可行性建议。

维吾尔族年龄堆积问题主要集中在南疆三地区的农村人口中。其中20岁以下年龄组申报较为准确,40~49岁女性的误差较大,60岁以上高龄组堆积现象最严重,以高报为主,年龄越大,高报的幅度越大。除了18岁、45岁、60岁出现明显堆积外,人们明显偏好“0”、“5”,其中更多地指向以“0”结尾的年龄。

1982年,新疆惠普尔指数总体为131.1,女性为137.52,均高于1990年和2000年的值。这说明从1982年到2000年,新疆的年龄偏好现象正在减弱。可见,随着社会发展和年轻一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维吾尔族的年龄偏好现象在逐步减弱。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渗透,户籍管理的日臻完善,南疆农村将逐步与我国其他地区接轨,相信今后年龄的申报会越来越准确。

我们有理由预测,在今后30年中,年龄堆积现象会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其中年龄越小,年龄堆积现象越少。由于受到户籍管理政策波动的影响,60后和80后的年龄堆积现象要比70后严重,90后的年龄申报较为准确,00后的更为精准。

[收稿日期]2012-01-24

[作者简介]王海霞(1966~),女,湖北经济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电邮:uygurxj@163.com。武汉 430205

代建构论’[J].中国大陆研究,2000,(43),7.

[25]Gladney, Dru C. 1991,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6]Gladney, Dru C. 1998, *Ethnic Identity in China: 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 Orlando: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27]Kaup, Katherine Palmer, 2000, *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8]Mullaney, Thomas S. 2011, *Coming to Term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n Press.

[29]White, Sydney D. 1998, “State Discourses, Minority Policies,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the Lijiang Naxi People's Autonomous County”, in William Safran ed., *Nationalism and Ethnoregional Identities in China*, London; Portland, Ore: Frank Cass.

[收稿日期]2012-07-13

[作者简介]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电邮:marong@pku.edu.cn。北京 100871

Ethnic Issues and the “Nationality Recognition” Campaign in China in the 1950s

Ma Rong

Abstract: Following the model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established a “multi-nationality state” since 1949. A national campaign of “nationality recognition” was carried out across the nation, and finally 56 “nationalities” were officially recognized by the government. This framework became the base of all system and policy designing for minority groups and their regions in administration, education, legal system and financial affairs.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government policies in respect to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it is necessary to recall and rethink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nationality recognition” and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ed the results of this campaign. Oral history study will be very helpful for people today to understand those events, and this subject might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topic in the ethnic/nationality studies in China.

Key words: ethnic relations in China; nationality recognition; oral history studies

The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f Uygur's Age Accumulation—— Taking Kuche County as an Example

Wang Haixia

Abstract: According to past five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es, the age accumulation of Uygur is very striking, especially in villages, among females and elders. Based on fieldwork, this article classifies the phenomena of age accumulation and tries to find the reason for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ulture. Consequently, the author provides five suggestions on population census and selective examination and forecast the tendency.

Key words: age accumulati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contextualization; social interaction(See P.5)